
清末民初日本《支那史》在中国的翻译与影响

潘喜颜

内容提要：《支那史》系日本市村瓚次郎与泷川龟太郎合撰，该书于 1903 年由教育世界社译印出版，并出现了《中国四千年开化史》、《新体中国历史》等几个不同的编译本。该书用章节体撰述，重视文明史的写作和图表的应用，且薄古重今，颇具特色。它的几种译本内容虽有不同，但均作为教科书在中国学堂广泛流行，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关键词：翻译 清末民初 《支那史》

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大事件：太平天国运动、中法战争、中日战争、义和团运动、八国联军侵略……，世界要了解中国这一系列大变动和现代状况，须先了解中国的历史，以寻溯这古老帝国激剧变革的深层动因。因此，启端于 17 世纪的国外汉学，到了 19 世纪后期，其研究的核心转为以中国古代史为主、近代史为辅。特别是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，聚集了一大批东洋史学者，如重野安绎（1827—1910）、那珂通世（1851—1908 年）、林泰辅（1854—1922）、市村瓚次郎（1864—1947 年）、泷川龟太郎（1865—1946 年）等，他们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学、文化、社会、法律、思想、考古、语言、民族、民俗、地域、地理等领域，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历史全方位地进行了深入、详细、具体的研究，有难以计数的专著、论文问世。

20 世纪初，清政府对传统的教育进行改革。在 1902 年和 1903 年，先后颁布了由张百熙等人拟定的一系列学堂章程，形成了壬寅—癸卯学制。这一近代中国比较完整而系统的法定学制，以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为范本，在课程设置上将大量近代西学列入教学科目，大大地突破了传统的课程体系。在历史科的设置上，自蒙养学堂、初等小学堂一直到高等大学堂，均开设历史课。1905 年清政府又废科举，广设学校。这样，近代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遂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。当时中国通行的传统历史教科书，如《御批通鉴辑览》、《二十四史》等，卷帙繁重，难以卒读，不适宜教学，而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所使用的历史教材，又显得知识零乱，缺乏系统性，不合教学法。日本在明治维新后，编著了若干种世界史、西洋史、支那史、东洋史教本，如《万国史纲》、《西洋史要》、《支那通史》、《东洋史要》等，这些史书虽然对中国史实记载简略，但多采用新史体例，颇具“新学识、新眼光”，又较为简要，略加改编即可作为新式教科

书使用。这样日本学者撰述的大量新式历史著作就被翻译过来，以充当新式教科书之用，市村瓚次郎和泷川龟太郎合著的《支那史》就是其中之一。该书在清末出现了几种不同的中译本，且均作为历史教科书在新式学堂广泛使用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，但目前学界对该书的研究尚显不足，本文拟以《支那史》^[1]及其译本为中心，着重考察清末民初时期该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。

一、《支那史》作者简介

《支那史》的作者为市村瓚次郎与泷川龟太郎，二者均是日本的东洋史专家^[2]。

市村瓚次郎（1864—1947年），号器堂。1864年8月9日出生在常陆国筑波郡北条（现在的筑波市）。父名义信，母原姓森。他家在当地很有名望。祖父一代，以学问立世，和江户时代的水户学派人士颇有联系，他也受祖父以来的家学的影响。1877年，前往东京，进入当时著名的汉学家小永井小舟之门学习汉学，进而进入明治法律学校（明治大学前身）学习。1884年，进入东京大学古典科的汉书课（汉学专业）学习，教师有岛田重礼、中村正直等。东京大学古典科当时分汉书和国书（日本国学）两课，汉书课的学生有林泰辅、冈田成之、西村时彦等。1887年大学毕业。因有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志向，与林泰辅、小中村义象、关根正直等同学一起，成立东洋学会，出版《东洋学会杂志》。

1888年，他开始编述《支那史》。1889年，所著《支那史》1、2卷由吉川书店出版；是年，和落合直文等创办《文学杂志》，进行文学活动。1890年，《支那史》3、4卷出版；任学习院助教授、国学院讲师。1891年第5卷出版；1892年第6卷出版，全书完成，任学习院教授；这一年7月首次前往中国调查史迹，11月回国。

1893年，进而把全书缩写成《支那史要》上下两卷，当年出版上卷，1894年出版下卷。这是一部当时可与那珂通世的著作相比美的史著。是年9月起，东京大学史学科“支那史学”改称“东洋史学”。

1897年，他又将两卷本《支那史要》修订为《东洋史要》，并着手撰写多卷本东洋史著作。1939年开始出版的四卷本《东洋史统》，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作了较为系统、完整的研究：第一卷为上古至南北朝；第二卷为隋朝至宋、金；第三卷为明朝；第四卷为清朝和民国；并以中国古代史为核心，广泛研究了亚洲各国的历史、文化、经济、社会制度的发展、变化，着重论述了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演进的政治、文化、经济及周边的原因，其学术价值超过了当时日本汉学界同类著作，代表了当时日本汉学界中国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。因而在日本汉学界获得极

高的评价，被称为是和德国著名汉学家奥托·福兰阁（Otto Franke，1863—1946）博士的《中国通史》（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）并驾齐驱的东西方汉学界两大中国通史佳作^[3]。

泷川龟太郎（1865—1946年），号资言，是国际知名的日本汉学家，据说为日本战国时期武将泷川一益的后人。其父出生于岛根县，修汉学，长为小学教员。1865年11月12日泷川资言出生于松江，通称龟太郎，号君山，为藩士之子。明治初年，从雨森精翁、内村鲈香学汉文。1882年中学三年级中途退学，上东京入岛田菫村私塾；后又入东京大学附设古典讲习科，1887年毕业，同期有市村瓚太郎、和田英松、岛田钧一、林泰辅、山田准等人。由于非东京大学本科毕业，不通洋学，十年间未找到安定的职业。水泽利忠说他“时代急剧变化之时，仍然完全按照前一时代生活方式生活”。1888年，开始与市村瓚次郎合作撰写《支那史》，直到1892年才写完，由吉川书店出版。1897年9月，龟太郎前往位于仙台的第二高等学校就职。他最著名的著述为《史记会注考证》（东京：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；又台北：艺文、天工、宏业、洪氏、文史哲等各社出版）。他用20年的时间进行这一专题的研究，汇集中日两国关于《史记》的各家注释百余种，加以考证。全书以汉文文言文撰写，相当程度上还原了《史记》原文及注释，保留了关于《史记》的很多珍贵文献，为研究《史记》提供了重要资料。中国学者对这本著作评价很高，认为在新的《史记》会注会评本出现之前，这本书一直会是“《史记》研究者案头必备的有用之书”。《考证》资料详实，各种版本《史记》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，《考证》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，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，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，日人著作二十几种，上起盛唐，下迄近代，别择辑于注文中，时加审辨说明，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，以事串联，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，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，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，显然比三家注优越，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《史记总论》，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《史记》作书资料、体例、流传、演变、版本等事，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^[4]。

龟太郎师承，与市村瓚次郎一样为东京大学最早的“古典讲习汉书课”学生，其后学最具代表性的为水泽利忠。龟太郎与林泰辅、市村瓚次郎等人，均非日本当时主流派（疑古、抹煞），而不被重视，但他们为日本传统学术的继承者。

二、《支那史》三个汉文编译本之异同

晚清国人以日本市村瓚次郎、泷川龟太郎《支那史》为底本，共编译了《支那史》、《中国四千年开化史》、《新体中国历史》三部著作，现列表如下：

| 书 名 | 编译者 | 出版或发行机构 | 出版日期 |
|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|
| 支那史 | 桥本海关 | 教育世界社 | 1903 年 |
| 中国四千年开化史 | 支那少年 | 支那翻译会社 | 1902 年 |
| 新体中国历史 | 吕瑞廷、赵澂璧 | 商务印书馆 | 1907 年 |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三书虽然采用同一底本，但三者在章节安排、内容取舍上却不尽相同。

《支那史》正文八卷，末附《大事表》一卷，日本市村瓚次郎、泷川龟太郎同纂，桥本海关译，（1903 年）由教育世界社出版。该书的主要内容如下：卷一、总叙，叙述了中国的地理、人种等。卷二、太古史，共两章，简要叙述太古之传说、太古之开化。卷三、三代史，共六章，分别叙述夏之沿革、殷之沿革、周之初世、周之中叶、周之末世、三代之开化。卷四、秦汉三国史，共五章，分别叙述秦之兴衰、西汉兴衰、后汉兴衰、三国分立、秦汉三国开化。卷五、两晋南北朝史，共五章，分别叙述西晋盛衰、东晋兴衰、南朝沿革、北朝沿革、两晋南北朝开化。卷六、隋唐五代史，共四章，分别叙述隋室兴衰、唐室兴衰、五代更迭、隋唐五代开化。卷七、宋元史，共三章，分别叙述北宋盛衰、南宋及元室兴衰、宋元开化。卷八、明清史，共三章，分别叙述明室兴衰、清室治乱、明清开化之事。卷九、年表，包括《三代大事略表》、《秦汉三国大事年表》、《隋唐五代大事年表》、《宋元大事年表》、《明清大事年表》。每章之下又分若干章节，如在第四卷第二章后又分八章：汉楚纷争、高帝治世、吕氏专横、文帝治世并七国叛乱、孝武帝治世、霍光摄政并宣帝治世、宦官专恣并外戚跋扈、王莽篡立并败亡后汉兴衰。

《支那四千年开化史》，由支那翻译会社印行，翻译者为支那少年，发行所支那翻译会社（英界新马路登贤里），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十一月初五日印刷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正月初五日发行，全书定价为大洋八角。该书共九章，第一章地理；第二章人种；第三章太古之开化，分学术、制度、风俗三节；第四章秦汉三国之开化，分制度、学术、宗教、技艺、产业、风俗六节；第五章两晋南北朝之开化，分制度、学术、宗教、技艺、产业、风俗六节；第六章隋唐五代之开化，分制度、学术、宗教、技艺、产业五节；第八章宋元之开化，分制度、学术、宗教、技艺、产业五节；第九章明清之开化，分制度、学术、宗教、技艺、产业五节。另附有《历代大事年表》。

编者在《弁言》中自称“据东士市村氏、泷川氏所为《支那史》者，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备载之事实，而取其关于文明之进步者，断自上古以逮于兹，删其芜，补其阙，正其误，以饷我无史之士夫。”¹⁵考察其内容可知，《支那四千年开化史》选取《支那史》的总序及其中有关历代开化史的内容，编成了一部开化史著作。并且该书取消了《支那史》的《历代世系表》，只保留《历代大事表》，并补充了从光绪八年（1886）至光绪二十八年（1906）间的军政大事：高丽属中国、越南割于法、北洋海军成、印度分界、重庆会议、开釁于日本、马关和约、法开思茅等地、日本还辽东、日本议通商及行船章程、西卑利亚铁路准经满洲、德租胶州湾、俄租旅顺、法租广州湾、英租九龙及威海卫、康梁之狱、太后训政、立大阿哥、拳匪之乱、联军入京、两宫西幸、各国和约成、两宫回銮、李鸿章薨、大阿哥罢黜、开昭维新、东三省交收条约、天津交换、中英商约成等。《开化史》于清朝商业发展之事补充较多，如《制造》一节增添中国各种制造局的建设，《商业》一节还特别添加了中西交流内容，如《1899年中国与各国贸易额表》、《千八百九十九年大宗品物额表》、《千八百九十五年至千九百年六年间之出入总额列表》，以便于考察近年商业之盛衰情形。

《新体中国历史》，封面题《中学堂教科书》，编辑者为汉阳吕瑞廷、丹徒赵澂璧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三月由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印刷并发行。篇前有编者所加《叙论》六章，第一章，叙述历史之范围；第二章，叙述历史之种类；第三章，叙述历史与国家之关系；第四章，叙述历史与地理之关系；第五章，叙述历史与人种之关系；第六章，叙述本书大旨。在《叙论》第六章中编者称：“即近译日人所著东洋支那史，非失之略，即失之浑，求有繁简得宜、论断得衷，专详建国之体制、学术之隆替、武备之张弛、政治之沿革、文明之进步、实业之发达、风俗之变迁等事者乎？无有也。日本市村瓚次郎、泷川龟太郎所著《中国史》，于治乱原因颇有所见，因出己意，逐加考订，正其伪误而补其缺略，凡于政治之沿革、文明之变迁尤三致意焉。每朝之末必将其制度、学术、宗教、风俗、技艺、产业分类详述，俾可一览而知。”¹⁶可见该书是根据《支那史》编译而成。从章节目录来看，该书将《支那史》九卷改为六卷，实际上只不过将《支那史》的前三卷归入第一卷，将第九节的《历代大事年表》省略而已，其章节内容并没有减少，并且原书中各朝世系表也均照录。

该书文字较《支那史》略为简洁，对《支那史》有所改正，如在第一卷中删除《支那史》关于满洲人种的论述，将有关于中国历史的民族改为四种，即苗人种、汉人种、蒙古人种、回回人种。文中将“支那”改为“中国”，将清朝改为“我朝”等等。1911年前的版本在内容上增订并不多，清朝灭亡、中华民国成立后，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改正增订版（1913年），增加了清大兴文字狱、中法安南之交涉、中英缅甸、暹罗及中日琉球之交涉、中日朝鲜之交涉、军

港租借之交涉、西后之久握政权、拳乱之原委、日俄关东之交涉、宪政之纷纭、武昌之革命与清帝之退位等事，体现了史书编纂与政局变动的密切关系。

三、《支那史》的特点与影响

20 世纪初期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，无论是历史视野、史料范围、史书体例、历史词汇和史学理论等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。这一转变与 19 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外史学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。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外史学交流的重要媒介是日本，书籍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之路中最重要的事项^[7]。

清末民初时期，《东洋史要》、《支那通史》、《支那史》等从日本传来的史书，给古老中国的史学界带来了全新的史学视野、写作方式、历史观念，冲击了中国旧有史学，对于中国近代史学变革有重要的借鉴作用，诚如史学家王舟瑶所言：“中国旧史病在于繁，不适时用。日人新编，较为简要，且多新识。如桑原隲藏之《东洋史要》、田中萃一郎之《东邦近世史》、市村瓊太郎、泷川龟太郎之《支那史》、那珂通世之《支那通史》、河野通之、石村贞一之《最近支那史》、田口卯吉之《支那开化小史》、白河次郎、国府种德之《支那文明史》、皆足备览。”^[8]

从 1902 年 11 月到 1907 年 3 月，不到五年的时间，《支那史》竟有三种中译本面世，可见国人对于该书的重视。综合来看，该书在内容及体裁上有如下特色：

（一）《支那史》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纪传体、编年体、纪事本末体写作模式，采用近代西方盛行的章节体写作方式。也就是以时间先后为顺序，以历史事件为本位，分卷、章、节叙述。编排合理，脉络清晰，适于表现历史发展过程中纵横交叉的因果关系。

章节体是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下，适应资产阶级新史学而产生的一种史书体裁。在古代和中世纪，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西方历史学家只能对社会的各个侧面，诸如政治、军事、外交和宗教等，作一些直观性的、单一性的记录。因此，适合表达这些内容的西方史书体裁，不外乎多卷本的编年体、传记体和纪事本末体等。自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，大机器生产改变了人们过去的狭隘观念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眼光扩大到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，开始认识到史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；同时，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，促使社会分工专业化和系统化，表现在文化领域，学术愈发达，分科愈精细严密。这种变化引起了历史编纂学方法的进步。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在形式逻辑归纳法的启发下，首先改造了传统的叙述体，使之成为具有严整的篇、卷、章、节的章节体裁，既综合通贯，又分门别类，更适于表述历史发

展过程中纵横交叉的因果关系，比旧体裁的史书容量大，系统性强^[9]。章节体实际上是归纳逻辑在史书编纂上的体现。

章节体作为西方近代史学表现形式之一，最初传入中国是通过教会组织和出版机构为媒介的。特别是19世纪70—80年代以后出现的传教士史著，大多数直接采用了西方史书编纂体例，从谢卫楼的《万国通鉴》、艾约瑟译的《希腊志略》、《罗马志略》、《欧洲志略》、到林乐知、李提摩太的史著，有不少都是和中国传统史书体例不同的章节体。甲午战争后，章节体史书大多“借径于日本”而输入，如那珂通世的《支那通史》、桑原鹭藏的《东洋史要》、市村瓚次郎的《支那史》和《支那史要》、小川银次郎的《西洋史要》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一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和进步学者在吸取西学的过程中，主动选择和引进章节体史书，并向社会介绍推广。1896年，梁启超在《西学书目表》首列“史志”，把《万国史记》和《万国通鉴》列为第一条。他还在《东籍月旦》一文中重点介绍了《中等东洋史》、《支那通史》等日本章节体历史教科书。1897年，康有为编纂的《日本书目志》列举了许多日人译著的章节体世界史和国别史教科书。这些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新体史著，无疑给中国学者以相当影响和启发，他们顺应改革的潮流，学习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方法，或译著、或改编、或自撰，章节体史书自是纷纷问世，突破了封建传统史书体裁独占史苑的局面，推动中国历史编纂学向前跃进了一大步，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^[10]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史学方面，叙事结构的不同也使得人们对史事的处理方式产生变化。章节体的引入是一个关键性的变化，它使得事件不是孤立的，而是以一个发展的过程出现。章节体史书的翻译和传播，显示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趋势。此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大多采用了这种新的编纂形式，如夏曾佑的《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》和刘师培的《中国历史教科书》等。

(二) 该书非常重视近代史的撰写，与中国传统史书“厚古薄今”的做法不同。该书共九卷，但第一卷仅5页，第二卷太古史，4页不到，第三卷32页，第四卷35页，第五卷35页，第六卷43页，第七卷，48页，第八卷48页，卷九大事年表24页，呈现出年代愈后内容愈丰富的趋势。如关于鸦片战争，《支那史》以“鸦片烟之战”为题作了介绍：“英吉利国，明时即通支那。清圣祖世宗时，来广东贸易，自是输入鸦片烟颇多，流毒极大。”“高宗仁宗二朝，前后再烧其函，其输入益盛。宣宗时，输入三万四千函。湖广总督林则徐疏论其害，帝以则徐为广东总督。”林则徐广州禁烟，引起了英国人的不满，英兵遂进兵中国。英兵占领镇江后，南京大震，于是和英人议和。“帝初主战，至是知不可，乃起伊里布，与钦差大臣耆英，共赴英军议和，英等见英将，定条约七章，出银二千六百万两赔偿鸦片金，割香港为英国管辖，开广州、福州、宁波、厦门、上海五港为互市场，互通俘虏，且约勿得擅刑英人。于是和议全成，

两国均解兵。”^[10]在内容广阔的中国通史中提及了南京条约中规定的赔款、割地、五口通商和领事裁判权等细节，可见其对于中国近代史事的重视。

（三）该书注重文明史的记述。《支那史》在内容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：每卷除了叙述历朝大事外，还特别开辟开化史一章，从制度、学术、技艺、宗教、产业、风俗等方面阐述中国文化发展的状况，体现了日本文明史作品的特色。

日本文明史学是在西欧文明史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。西欧文明史学是英法资产阶级的进步史学。它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由未开化、野蛮到文明的无限进步的历史进程，从而破除了中世纪用神的意志来解释历史现象的宗教史观，使历史摆脱了宗教的羁绊。西欧文明史学的代表作如法国基佐的《欧洲开化史》、英国巴克尔的《英国文明史》等，在1875年到1879年间多次被译成日文，名噪一时。在西欧文明史学的熏陶下，日本出现了一批文明史学家和著作。福泽谕吉的《文明论概论》（1875）和田口卯吉的《日本开化小史》（1877），是两部代表性著作，在史学界高树文明开化的旗帜，奠定了文明史学的基础^[12]。文明史学作为一种新兴的资产阶级历史观，对于打破传统史学一味着眼于政治史、军事史的狭隘观念，拓展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野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。19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东西文明史作品如基佐的《欧洲文明史》、巴克尔的《英国文明史》、田口卯吉的《支那开化小史》和《日本开化小史》、高山林次郎的《西洋文明史》和《世界文明史》等纷纷译介到中国，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支那少年正是依据日本文明史学的观点，将《支那史》中有关帝王的事迹删去，专取有关于文明进步者，编成了《支那四千年开化史》。并在《弁言》中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批判：

“恫哉！我国无史，恫哉！我国无史。庞然塞于栋者，非二十四史乎？我谓二十四姓之家乘而已，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，乃于文化之进步、民气之开塞、实业之衰旺，概乎弗之道也。我国士夫，嗜古若性命，我国无古之可言也。恫哉！我无古之国！哀哉！我嗜古之士夫！支那少年喟喟忧之，乃呼将伯于东土，据东土市村氏、泷川氏所为《支那史》者，去吾二十四姓家乘所备载之事实，而取其关于文明之进步者，断自上古以逮于兹，删其芜，补其阙，正其误，以饷我无史之士夫。”曹鲲化受西方和日本的文明史、开化史著作的影响，认为国史编纂应该“参酌东西洋历史史体，确察我国民缺少之原质，核定大义，以叙述古今人群进化之大势，盛衰隆替之原因结果，及万般社会之重要事实，为独一无二之主脑”^[13]。他编著的《中国历史》系“仿泰东泰西”文明史及开化史例而作，其书在叙述社会发展大势的同时，用近一半的篇幅，详记各时期文明发展状况，内容广泛，涉及政治、学术、宗教、美术、风俗、实业、财政、交通、美术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，提出了不少新见解。

（四）该书重视图表的使用。《支那史》篇幅不大，但图表甚多，除后面所附《三代大事略表》、《秦汉三国大事年表》、《隋唐五代大事年表》、《宋元大事年表》、《明清大事年表》外，篇中还有《夏帝系》、《殷帝系》、《春秋灭国表》、《战国七雄兴亡表》、《周帝系》、《秦帝系》、《前汉帝系》、《后汉帝系》、《晋帝系》、《十六国表》（年代用日本纪元）、《南朝帝系》、《北朝帝系》、《齐周刑名图》、《隋帝系》、《唐帝系》、《隋唐五代职官表》、《五代帝系》、《宋帝系》、《元帝系》、《辽帝系》、《夏（西夏）帝系》、《明帝系》、《清帝系》。众所周知，中国历史上，朝代更迭频繁，分封立国众多，学术流派纷呈，典章制度复杂，如何以较少的文字表述这些现象呢？《支那史》采用大量使用图表的方式，既节约了篇幅，又达到了说明不同情况的目的。且列表形式一目了然，适合教学，便于学生把握历史线索。

正因为《支那史》具有上述特色，使得该书在中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《支那史》及其编译本《中国四千年开化史》、《新体中国历史》都曾作为历史教科书被清朝的新式学堂使用。《中外日报》^[4]1903年5月25日的广告大力称赞了《中国四千年开化史》：“支那开化之早，卓冠万国，顾史界现象黑昧昏黩、莫可名状，譬弗有良质弗之凿也，乃有识贯今古、笔挟风霜之少年编为是书，以制度、学术、风俗、宗教、技艺、产业为经，以列代为纬，喝破四千余年之昏雾，放出一线之旭光，又校仇精密，文笔华美，诚教之要籍，学界之奇观也”。该书至1906年4月已经出版了4版。

《新体中国历史》在《叙论》中称该书“凡于政治之沿革、文明之变迁尤三致意焉。每朝之未必将其制度、学术、宗教、风俗、技艺、产业分类详述，俾可一览而知。若我中学校据为教科书，则读者自知社会之变迁，文化之由来，以发扬其爱国之心，团结其合群之力，以收历史之效果。至其书中体例，熟加斟酌，大约参取于编年、纪事二种，而各揭其所长，期于取便讲授为第一义，阅者不以事不师古凭意私造罪之，幸甚！”^[5]该书出版之后，亦受到了各地学堂的好评，1907年出版以后，连续再版，1908年10月已经出版了第七版，中华民国成立后，该书稍作改编，被教育部门审定继续作为教科书使用，1913年5月已经出版17版，其持久的生命力不言而喻。1915年8月，泷川龟太郎和当时“一高”的盐谷温一起前往中国的上海，还曾购得《支那史》的中译本^[6]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。

（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 李振声）

注释：

-
-
- [1]市村瓚次郎、泷川龟太郎《支那史》，上海：教育世界社 1903 年，上海图书馆藏本。
- [2]参见李庆《日本汉学史·起源与确立》，上海：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，第 442—450 页。
- [3]王德春《对外汉语论丛·第三集》，学林出版社 2003 年，第 306 页。
- [4]同上。
- [5]支那少年《中国四千年开化史》，支那翻译会社 1902 年版，上海图书馆藏本。
- [6]吕瑞廷、赵激璧《新体中国历史》，商务印书馆 1907 年版，上海图书馆藏本，卷 1 第 5 页。
- [7]邹振环《东文学社及其译刊的〈支那通史〉与〈东洋史要〉》，《域外汉籍研究集刊》第三辑，中华书局 2007 年，第 347 页。
- [8]王舟瑶《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》，二编，第 2—3 页。
- [9]张文建《试论近代章节体史书的兴起》，《历史教学问题》，1984 年第 5 期。
- [10]胡逢祥、张文建《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，第 269—270 页。
- [11]同[1]，第八章。
- [12]坂本太郎著，沈仁安、林铁森译《日本的修史与史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，第 188 页。
- [13]曹鲲化《中国历史》（上），第一章：历史之要质，东新译社 1903 年印本。
- [14]《中外日报》，汪康年主编，上海图书馆摄制缩微胶卷，从 1898 年 8 月 17 日—1908 年 11 月 19 日的内容保存比较完整，仅有部分缺页。此外还存有 1909 年 1 月 14 日、2 月 18 日、7 月 18 日、1910 年 7 月 11 日几期。
- [15]同[6]。
- [16]同[2]，第 446 页。